

赣南游击词十二首

为晓，行人睡未早，露侵衣被
一宿寒，树间唧唧啼知了，满身

影草。

靴脚露草，

冷腹不用愁，粮食封

小，事家中存，未法可愁，

小者。

岳修福我祝玉五

山空消兵，屋指野来心

小亦默再留君。

行，溪雨苦兼向，野老

人道号道途，大村遮身林

明，几番噩梦成。

放晴，对月忆彭茶，清风


未，侏脛瘦，哀身，萬劫若

心，夢中全破空。

鐘，耳喧天，依，林外，

赣南三年 游击战争

陈丕显



赣南三年 游击战争

陈丕显



人民出版社

封扉设计：尹凤阁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陈丕显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112,000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3,000

书号 11001·521 定价 0.55元



谭震林 摄于一九三七年春

序 言

陈丕显同志写了这本关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的书。他要我为这本书说几句话，当作序言。我说什么呢？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可是事隔这多年，我的记忆毕竟

不如从前了。

但是我兴味浓厚地读了丕显同志这部书。这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记录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它离开今天都快有半个世纪了。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事实上是一部战史，并不仅仅是一部回忆录。写得精明扼要，而又很完整；生动活泼之中，却十分严肃；它本身就有它的历史意义，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十月。

当时蒋介石结集大量兵力，亲自指挥，并由纳粹德国将领任顾问，以堡垒政策逐步地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逼。而我党领导人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其结果是我红军主力的各个部分都无法发展、扩大，也不能转入抗日战争，只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另行北上抗日。于是，在这种条件下，留下来的南方八省的红军，面对着强大的敌人，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夏天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一个历史新阶段才

出现。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这部书用史笔写出了赣南三年战史的来龙去脉，它的发展的全过程，它的重要侧面和事件，写出了历史的具体情况，还形象地再现了许多普通的战士以及英雄人物，他们出入于崇山峻岭之中，茅草密林之间。他们勇敢、机智，洒热血、抛头颅，忠于党，热爱人民，他们用他们的血汗和生命，开辟了一条革命的胜利道路。

这部书里，有不少篇幅写到陈毅同志的际遇和行动，他的英姿丰采，音容笑貌和他的许多讲话。陈毅同志的语言是生动的，诙谐而又发人深省，一针见血，极有性格。在陈毅同志留下的诗篇之中，特别有一篇《赣南游击词》是以形象思维，吟唱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战斗生涯的。丕显同志在这部书里，尤其在第六章、第八章里，用了许多具体的事迹和生动的范例，为这一篇词作了周密的注释。这就使读者更能体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何等的艰苦，如何地重要了。

正是红军主力的北上抗日，南方八省的游击战争，加上东北义勇军的浴血抵抗和长城线上的保卫战斗，打响了全国性的抗日枪声，又有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紧密配合，使得蒋介石日夜被抗日烽火所围困，既不能阻止红军主力北上，更无法抑制游击队的英勇活动，最后不得不参加在全民抗战之中了。

正是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并在尔后的三年中，保存和卫护好革命的火种，使它不灭地燃烧，终成燎原之势。它飘扬起鲜红的旗帜，坚定了人民的信心，在百折不挠的血战中，为我党锻炼了一批骨干，逐步发展而成为伟大的革命武装。正如长征红军是八路军的前身，南方游击队后来成为新四军。

这部书是一千个日日夜夜的活生生的可泣可歌的记录。读者们可以看到红军游击队怎样在远离党中央的敌后，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了面临着的一切困难问题，怎样依靠着人民群众的力量，粉碎了装备优良的超过我三五十倍的敌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

丕显同志以赣粤边斗争的亲身经历为主，结合各地游击区同志的回忆素材，而写出的这部书，是一部好书。当时，中央指定的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是在那里的，党的领导核心机关也就在那里，丕显同志也正好在那里，所以他记述他亲身经历过的斗争是可以代表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相当部分的。然而他很少写他自己，而更多地刻划了领导者的形象以及战士和人民的群象。这部书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写的，具有相当的概括力，寓一般于个别中，能使读者对当时重要的决策如何形成，革命群众如何贯彻执行它们，从而对于三年战争的全局，有所认识。

然而当时各个游击区都有它们自己的一些特点和重点。比如有的地区，是集中兵力向四面八方出击的，在蒋介石的主力赶不到的地方，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这对蒋占区人民是有力的鼓舞，自己虽也受到一些损失，却推进了抗日运动的发展。另一些地区，是属于老区了，是十多年来的游击区，那里的地主武装和保甲长几乎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上，我们的行动主要对付蒋介石的主力军，这些主力军的行动总是有弱点的。我们及时掌握了这些弱点，就能不失时机，一个个地消灭敌人的主力。

当年我是和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在一起的。我们始终在闽西和敌人周旋着。虽然各个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给敌人切断了，但我们大家都经受了共同的严峻考验，遭遇是相同的，始终患难与共，是互相支援着的，呼吸相通，同声共气。所以读了这部书，当年的战斗情景又展现在我眼前。我感到有责任将它推荐给读者。

红军的长征用了一年时间，行程两万五千里。南方的游击战争用了三年时间，斗争的艰苦也是无奇不有的。但我们的指战员从不在困难面前低头。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建立革命军队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过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革命的军队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考验自己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如此。青年同志读一读这部书吧，这对我们艰苦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将是有益处的。

谭震林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一日

目 录

序 言	谭震林
第一章 转折	(1)
第二章 突围	(11)
第三章 会合	(21)
第四章 新起点	(29)
第五章 北山事件	(35)
第六章 反“清剿”	(46)
第七章 扎根	(59)
第八章 反搜山	(68)
第九章 大发展	(79)
第十章 “两面政权”	(89)
第十一章 梅岭事件	(100)
第十二章 突变	(110)
第十三章 谈判	(119)
第十四章 集中	(129)
第十五章 下山	(135)
后 记	(144)

第一章 转折

一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赣南，正是秋高气爽桂子飘香时节。可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却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红军主力被迫作战略转移。悲壮的气氛弥漫于中央革命根据地。

对于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是在非常匆忙中作出的决定，作出之后，既没有向领导干部说明情况，更没有向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作好动员。相反地，他们以所谓军事上要保密，强调要等红军主力渡过赣江，进入白区以后，才准许宣布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因此，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何日出动？将去何方？是否很快就会回来？红军主力走了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将怎么办？这些人人深切关注的问题，可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被闷在鼓里。甚至当时身为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同志，也不知道。

陈毅是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战役中，坐骨中弹受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的。他的坐骨碎片，如不开刀取出来，伤就难以治好。医院里虽然是有爱克斯光机的，却没有电，照不成片子就开不了刀。他住院已一个多月，这问题还解决不了。

十月九日，中央军委周恩来主席到医院探望陈毅同志。他来到陈毅的病床前，并告诉他：红军主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让项英和你们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要你留下来是因为你能打仗，

懂得军事，可以帮助项英。而且你伤势未愈，不能远征。现在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了？他这样问。这才发现陈毅需要拍爱克斯光的片子，但没有电，不能拍。恩来同志立即派人去把电台的一架发电机抬到医院里来。这架已经包装好准备随军长征的爱克斯光机器，被重新解开，马上发电，由医生拍了照片。看清了碎骨部位，当场给陈毅做了手术。

就在探望中，周恩来给陈毅讲了中央的决定：

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党的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同志组成。项英同志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并兼政委，贺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

十月十日晨，我红军主力的指战员们，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红色的土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留下的同志们，和长征的战友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夹道送别亲人，千叮万嘱，热泪沾襟。

十月十二日那天，阴霾满空，炮声隆隆，陈毅半躺在病床上，心情异常地焦急。正好项英派来了担架，即刻把他接回机关。项英给他传达了中央的部署，并且和他商讨今后的斗争大计。当时留下来的红军，计有：

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

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

赣南军区的六团；

闽西军区的三个团；

杨（殷）赣（州）军分区的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加上各县独

立营；

以上共有武装力量三、四万人。瑞金、会昌、于都、宁都等县的“三角地区”，已经划定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他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

陈毅听了项英的传达，也说了他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当时蒋介石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主力红军；另以十几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瞬息之间，黑云压境，敌军群集，大风暴随时可能袭来。可是项英同志认为形势很好，还要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陈毅同志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现在要赶快部署打游击。项英却把陈毅的清醒估计，说成是他“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但是对那种不清醒地估计当前形势，不承认反革命力量暂时强大，看不到革命低潮到来的错误认识，才大失所望呢。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原任闽赣省军政委员会团代表，不久前才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共青团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不久，又调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当时共青团也称少共）。本来我以为会跟红军主力走的，没想到领导要我留下来。对项英，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陈毅，我看见过，感到他看问题敏锐，胸怀坦白，说话豪爽，待人诚恳，可亲可敬，很愿意在他们领导下工作。那次是他们第一次商讨，我并没有在场。但是事后得悉，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对形势的估

量和斗争的部署，他们是存在着原则的分歧的。

项英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想象中的红军主力大捷上。他说，“红军主力会在湘西或湘黔边，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待等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的革命根据地。”

陈毅提醒他说，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还留在这里专门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因此，陈毅提出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他说，“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陈毅同志是说得很对的。记得一九三五年新年时在中央分局驻地，我看到了瞿秋白同志。他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他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嗽着。当时我感到十分惆怅，象他那样的身体，怎能坚持打游击呢？

但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要“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把“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作为部队的中心宣传口号提出来。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他还打算搞军事学校、兵工厂，迷恋于旧的形式，企图再搞起个大的革命根据地。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象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各个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却把地方的许多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用来充实红军第二十四师，要同敌人打硬仗。他说：“我们有主力第二十四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

消灭敌人一个师。”

陈毅不赞成这种做法，说：“请不要忘记，正是这种死打硬拚的战术，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搞垮的。”他认为过去那一套大规模根据地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全都要收起来。大家背起快枪打游击去，不要让敌人找到目标。

项英不以为然。他是书记、司令员兼政委，重大问题最后必须由他决定，他没有及时采纳陈毅的意见。在这转折的紧要关头，竟然错过了大好的时机。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因为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吃过苦头，被我们打怕了，一时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急进。加上他们对红军主力的转移，曾作过种种判断，耽心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北路敌人仍然用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战法，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而南路敌人则已撤回广东。这个时机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完全可以加以利用，实行分散打游击的转变。

这个时机被错过了。特别遗憾的是，项英还按照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意图，一度把政治军事形势秘密封锁，使干部和群众不晓得面临的局面多么严重。有些同志根据以往的经验，天真地以为红军主力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归来。工农剧社的演员，还天天忙着创作、排练，准备演出，庆祝胜利。他们操琴、练歌，唱的是“胜利的号炮”（这是歌词中的一句重句）。那时，我们还参加过工农剧社的晚会，有民歌、独唱、舞蹈和话剧。天下着雨，群众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看演出，真是一派“升平气象”！

二

形势不出陈毅所料，一天天地紧张起来了。

十月二十六日，敌人侵占宁都。

十一月十日，敌人侵占瑞金。

十一月十七日，敌人侵占于都。

十一月二十三日，敌人侵占会昌。

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

接着，敌人从北、东、西三方面向内紧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方法，将广大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将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区“清剿”，进而彻底消灭我们。

敌人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清剿”。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坚毅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人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被反动派杀害的人数达七十余万。

那些穷凶极恶、暴戾恣睢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恶霸地主，趾高气扬、气焰嚣张地对贫雇农说：“你们红得一世？”贫雇农响亮地回答：“你们白也白一生勿得（意思是也白不了一世）！”他们坚信：“只要穷人不妥协，总有一日见红天。”

这时项英同志依旧傲视敌人的暂时强大，仍然集中兵力，要和敌人死打硬拚。十一月二十一日，当侵占瑞金之敌向会昌进攻时，项英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湾塘岗，伏击了东路的敌第三师。这一仗虽然歼敌半个旅，但也削弱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失策的是暴露了自己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的目标，给敌人造成了四面合围的机会。敌人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跟踪红二十四师，使我们陷于更加困难的被动局面之中。

湾塘岗战斗的教训，迫使中央分局进行了新的布置，派出得力干部到各地区去领导斗争。张鼎丞同志回到闽西，钟循仁同志去了闽赣，胡海同志回到东固。另外一部分干部调往地方武装中去，

以加强各地区独立作战的能力。但是转变只是局部的。

不久，南路敌军由广东边境回防赣南，从东、南两面向我“最后坚持阵地”进攻，与北路敌军配合，南北合围，拉网夹击。我二十四师、独立三团和十一团，在狙击战中未能取胜。后在牛岭战斗中，以五个团的兵力去攻打一个团上下的敌军，却被各个击破，遭到惨败，所谓“最后坚持的阵地”也失守了。

十一月底，在中央分局的会议上，陈毅提出了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接着，形势更加严重了，项英终于同意陈毅的意见，并要陈毅起草个指示发下去，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和贺昌三位同志保持领导，其他成员都分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个游击区。分局和一部分部队，赣南省党政机关和部队，则都转移到仁风地区，待请示中央后再确定行动方针。

陈毅写出了指示，但这时已是年底，许多地区已被敌人隔断，无法联系，指示精神就没有传达下去。

三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大风暴临头了。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和赣南省的机关和部队已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仁风地区，形势非常紧张。战士和群众正在山腰上，在深谷里挖战壕、筑工事，埋藏物资，坚壁清野。

这天傍晚，我向山腰上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是国民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的话的。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经站在他的身旁，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不能赶走它？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真该检查检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袋有问题。

这时一个久经风霜的老战士老党员黄兴洪说话了，他说：“大炮说的脑袋问题很值得注意，但是，到底谁个的脑袋有问题，需要辨别。我看大炮的决战呵，反攻呵，都是他自己的马列主义，是否也需要检查检查呢？”

唐大炮显然被激怒了，他立即反驳：什么是我的马列主义，什么是你的马列主义？黄兴洪吸一口旱烟回答：讲道理我不行，讲打仗还可以说一点。我们白手起家，创造了根据地，靠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发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声东击西，都是成功经验。现在把各地部队拉到这里来集中，让敌人包围我们。没有游击队牵制敌人，我们这样硬拚行吗？

两人一争，我很受感动。我就说：目前的环境是困难的，你们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看是要面对现实，才能战胜困难。兴洪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是对的。唐大炮未免过份乐观了。到底怎样行动，仗怎样打？听候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吧。他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中有威望，是群众信得过的领导人。

我回到营地后，那晚上睡得很迟，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袋里也尽是傍晚的争论问题。唐大炮是学生出身，他看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指示，说的话也并不是乱说的。黄兴洪同志是瑞金武阳附近的农民，经过长期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他提出部队过份集中的问题，值得深思，他是我们赣南军区直属团的一个连长。那晚上我百感丛生，但我至今还鲜明地记得我是反对唐大炮，赞成黄兴洪的意见的。

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听到东南方传来了隆隆炮声，敌人已迫近

我们的指挥中心了。我赶到了工农剧社那里去开一个会，因为忘记了开路条，半路还给儿童团的岗哨喊住，受了他们一顿盘查。

会议一开始，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报告。我记得他说的是“目前的战争，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来一个大转变”。

我真没有想到在一夜之间，局势已急转直下。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见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他已派了几个通讯员去找过我了。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一间屋子里，给我传达了党中央头天发给中央分局的两份电报。正是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党中央的声音越过崇山峻岭而来到了。

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党中央的另一份电报指示：“反对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等等。

蔡会文同志对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的电报指示。陈毅同志说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同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将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的具体部署是：

(1) 独立红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过封锁线转至闽赣根据地。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县(宁都)以北，开展游击战争；

(2) 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随陈潭秋、谭震林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同志的队伍会合，坚持闽粤边的游击战争；